郑州日报

2010年1月21日 星期四

精品文摘 第171期

编辑 李昆霞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b1616@sina.com

13

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

十年展望：绿色、健康、有尊严

21世纪的首个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急剧变化的十年！在2010年的历史坐标点上眺望2020年的新生活景象，一方面使我们心潮涌动，一方面也让我们喜中有忧。无论有多少不确定性，我们的镜头都将定格为一个提前实现的崭新的小康生活画面：绿色，健康，有尊严。

绿色，将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首先是绿色生产。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中国的人均GDP现在已经达到3000美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20年再翻一番达到6000美元没有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目前美国的水平。应该说，我们的社会生产函数中真正构成约束的已经不是资本和劳动。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生产方式，资源(特别是能源)和环境就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因此，实现绿色生产，也许是未来十年我国社会生产函数优化的最优解。

其次是绿色消费。2020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未来的消费方面不会再大快朵颐，更不会暴殄天物。鱼翅应该在宴席上消失，各类野生动物会受到更好的保护。总体上，节能环保将会是人们衣食住行用当中最时尚的生活元素，并由此构成了未来消费的主色调——绿色。

健康，将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首先，我们的衣食住行将更加健康。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营养更加丰富和全面的食品都会摆满我们的餐桌。穿衣方面，太空棉之类以化纤为基料的服装会减少，以彩棉为基料的纯天然服装会成为时尚。

节能环保的智能化住房设计将为我们打造出循环经济的生活社区样板。3G手机、可视电话等通信工具是低辐射的产品才能被广泛接受。城市之中和城际之间的轨道交通会是人们出行时安全快捷的首选。旅游将成为人们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催生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其次，我们的教育和医疗将更加健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将改应试教育为能力教育，改变“填充式教育”为启发式教育，让下一代在健康快乐的氛围中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十年之中会有近亿万大学生和留学生毕业或归国，并成为创造性劳动的生力军。在职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社会教育网络会逐步完善。健康和完善的人格将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人们不会满足于做一个网上信息的“知道分子”，一定会通过系统读书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再次，我们的网络和游戏将更加健康。互联网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对生活起到了革命性的影响。2020年，并行计算和云计算等计算机技术与更加快捷的网络技术相结合，会使人们在网上毫无障碍地云游世界，尽情享受信息网络带来的丰富性。毒害了多少青少年，甚至一些成年人也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的色情网站和暴力游戏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同时，各级政府会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持续的整治。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十年的治理，一个干净的网络环境和健康的网络世界将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基本保证。我们可以在网上“偷偷菜”，找找乐，但绝不能沉湎于网络游戏世界的打斗，甚至以网上“杀人”为乐！除了虚幻的网络世界，现实中的游戏规则也在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通过对“赌球”行为的大力整治，相信中国的游戏环境到2020年会是一个健康的局面。

大国复兴说到底是文化的复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文明的标志，文明是文化的核心和价值体现。2020年的中国将通过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向全世界展现风采。

有尊严，将是生活的共同价值观

一个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一定是彼此互相尊重。尊重他人的劳动和权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将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财富的最大化与福利的最大化从来不是同一个概念，而公平分配是福利最大化的制度路径。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再造，实现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目标，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未来十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使亿万农民涌入城市。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城市生活如何是我们这个二元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志之一。如何使上亿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是未来十年定要实现的目标。与此同时，城市的贫民、失业者、残障人、乙肝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等弱势群体在基本生活、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权利理应得到保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环境的严峻约束，真正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我们就能够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优化型社会；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我们就能够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如果我们能够禁绝一切黄赌毒，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习惯，我们就能够实现绿色、健康、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领袖

李嘉诚

领袖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

要成为好的管理者，首要任务是自我管理。要经常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宏伟的梦想？我懂不懂得什么是节制的热情？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我有没有拼战命运的决心？我有没有实用的智慧？我有没有面对顺流逆流、懂得恰如其分处理的实力？你的答案可能因时、因事、因处境而有所不同，但思索是上天恩赐人类捍卫命运的盾牌。很多人总是把不当的自我管理与交厄运混为一谈，这是很消极无奈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很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

其次，所有企业领袖都应是伯乐，责任是甄选、延揽“比他更聪明的人才”。挑选团队，忠诚是基础，但光有忠诚而能力和道德水平不高的人迟早会拖累团队、拖垮企业。建立同心协力的团队的第一条法则，是能聆听到沉默的声音，能挑选有原则和坐标而不妄自尊大的执行者。

还有两点不要忘记，第一，特别要花心思在脆弱环节；第二，在任何组织内，优柔寡断者和盲目冲动者均是一种传染病毒。前者的延误时机和后者的盲目冲动均可使企业在一夕之间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做领袖者，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傲心但有傲骨的团队，在肩负经济组织特定及有限责任的同时，也要努力不懈，携手服务，贡献于社会。

摘自《青年文摘》

从简朴到简约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你在他们的博物馆里看到那种传统生活中纯朴的直线、那种很少人文雕琢的简洁、那种木头柔韧的材质与本色的生态美，也鲜明地在他们现代的生活中被使用着、表现着、享受着。

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文化主体元素。

它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审美是文化中深层的要素。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现代文化。

北欧人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转型，是有历史文化优势的。首先它们的历史较为单纯，没有太多的文化的更迭；再有是地处偏远，距离几个重要的欧洲文化中心如佛罗伦萨、巴黎、法兰克福等都较远，源自这些中心的一些重大的文化思潮，如同发生地震的震中，到了北欧就影响大大减弱。比如崛起于十七世纪意大利的巴洛克文化，那种跃动的曲线、华丽的图案以及流光溢彩，在巴黎和维也纳几乎沉迷了二百年，弥漫了整个朝野，但对北欧的文化及其审美影响却甚微。在北欧人的审美中几乎找不到巴洛克的文化成分。没有过深过重的人文积淀，反而使北欧较轻松地找到自己在现代文明中的文化位置。

比较起来，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了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地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再看看北欧人。看似他的传统的横平竖直和很少雕琢，极容易与现代工业审美结合，其实不然。比方，他们与德国人不同。有着重工业传统的德国人更喜欢用钢铁作为建筑与器物的材料。北欧人则坚持使用他们传统的木头。在这些森林茂密、盛产木材的国家里，他们在温暖的木屋里，使用木头造床、桌椅、盆罐、勺子和笔杆来生活。木的文化深入到他们的骨头里。今天他们依旧坚持使用这种具有亲切感的材质，而且决不刷漆，凸显木头的本色与气息。这样，木头本身的质感与色泽，已成为北欧人简约的现代审美的元素了。如果说德国人的现代审美多一些冷峻，他们则多一些亲和。

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瑞典是崇尚发明和设计的国家。瑞典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使用自己的传统元素时，要做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决不草率。在这一点，看看瑞典人的家居装饰的连锁店“宜家”里的各种物品就会一清二楚。另一方面是公众的认可。没有公众认可，就不会成为集体审美，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这公众的认可需要全社会有着现代审美的要求，需要整个社会具有较高的审美素质与文化水准，这就必要有美育教育，可是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

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在这一点上，北欧人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呢？

摘自《今晚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 com

名流故事

张海迪：婚后这些年

张海迪的丈夫王佐良是经朋友介绍相互认识的，然后两人一直通信，发现彼此性格、志趣十分相投，于是在1982年结了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一切都在平静中度过。现在山东师范大学从事翻译工作的王佐良希望能够保持这样的生活，所以一直拒绝在媒体上露面。

原籍上海，曾在安徽插过队的王佐良斯文儒雅。1991年1月，海迪被诊断出患了基底细胞癌。同年，佐良陪着海迪赴上海中山医院做无麻醉手术。

手术前，海迪对佐良深情地说：“如果我活下来，当然非常幸运，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生活，但如果我死去，也是时候了。这么多年拖累你，我跟朋友们讲了，如果我死了，让他们给你找一个健康的、比我更好的女人。”佐良握着海迪的手，眼睛湿润了。

手术后，护士推着海迪从手术室刚一出来，佐良就一个箭步冲上去。见海迪脸上绕着厚厚的绷带，还浸有血渍，佐良又难过地流泪了。倒是海迪忍着疼痛，劝慰佐良：“如果在战争年代，你肯定当叛徒，不然我做手术你干吗吓成这样！”手术、植皮、放疗，细胞被大量杀伤，体力被大量消耗，头发也大片大片脱落。但是，海迪靠着真挚的爱情和乐观的精神，再次战胜了病魔。

说到佐良的爱好时，海迪笑了：“他什么爱好也没有，除了做学问之外，最大的优点就是爱干净，打扫卫生洗衣服。”有一次，海迪问佐良：“你能感觉我是个残疾人吗？”佐良说：“我觉得你比健康人还有魅力。”

海迪有许多书，其中很多书都是佐良给她买的。有时为了买一本书，佐良常常要跑许多路。他还把那些海迪没说要买的书的目录抄下来，带回家让海迪选择。

少女时代就喜爱画画的海迪，在写作之余还创作了许多油画。为了海迪的那些油画，佐良又变成了个木匠。海迪的油画有时需要配旧船板那种颜色的画框，佐良就用棕色、黑色鞋油混在一起涂染，效果极佳。有几幅油画在韩国展出时，被一位大商人看中，愿意出高价求购，但海迪婉言谢绝了，因为它包含着佐良与她的感情！

张海迪爱唱歌，时常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有时，张海迪、王佐良拿起麦克风，来个夫妻对唱。张海迪唱歌，颇有天赋。她的MTV《我的梦》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还获得了首届中国音乐电视大奖赛金奖。

1998年上半年，张海迪和丈夫王佐良合作，共同翻译了美国当代作品《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这本书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读《莫多克》的时候，我一次次地流下了眼泪。我觉得，遇到那些哀伤的段落我会译不下去的，我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请爱人王佐良与我一同翻译，这是我们十几年来第一次合作。只有一本原文书，我每天下午翻译我的章节，他就在夜晚进行工作，我将那些伤感的章节‘让’给了他。”

两个相爱的人，每天都想着为对方做点什么。张海迪虽然只能靠轮椅移动，但她还是尽可能地做一些家务活，比如扫地、擦桌子什么的。她还喜欢做饭，但家里厨房太小，轮椅进不去，她就让王佐良代替她“操作”，做她配制的菜。张海迪对夫君的“不满”只有一点：王佐良不擅长烹饪。家里只有他俩的时候，王佐良总是提议吃方便面。

张海迪回顾自己20多年的婚姻生活，感觉很欣慰。她说：“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成绩。我们坦然地面对生活，从不理会各种猜测。我想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当然渴望有一个孩子，女孩儿。我曾跟我爱人说，如果我们有孩子，现在也该上大学了。想到这些我的确有一丝伤感。”

一次，海迪问佐良：“我们没有孩子，等我们老了，该怎么办呢？”佐良将海迪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平静地说：“到那时，我们一起上敬老院。”

摘自《家庭生活报》

孙红雷的眼泪

孙红雷是个固执的人。固执得彻头彻尾，不管对方是谁。

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开拍时，孙红雷还不红，很年轻，积累了一定的表演经验，一心想红起来。拍第一个镜头时，张艺谋就领教了孙红雷的固执。

冬天，下着雪，院子里的土地白了，石头白了，那个教室的瓦房顶也白了，瓦房顶的天空更是一片苍茫。母亲坐在雪地石头上，怀念刚去世的教师老伴。父亲去世，远在城市的儿子回家奔丧。

孙红雷扮演的就是这个远道回来的儿子。孙红雷看到“妈妈”坐在寒冷的天地间，“妈妈”说，生子，你的父亲没了，再也见不着你的父亲了。孙红雷扮演的生子立即大哭起来。

就在这一哭上，孙红雷和张艺谋较上了劲儿。孙红雷认为，我哭得多好啊，多痛啊，这可不是一般人想哭就能哭成这样的。可张艺谋说，你完全不对了，你就不会表演。

孙红雷不服气了，凭什么说我不会表演，一个孩子父亲没了，见到雪地里泣不成声的母亲，不哭还能怎么着？

孙红雷就别不过这个劲儿，再演还是哭，再演还是哭……

张艺谋那时候已经48岁，是个成熟的男人。他有着成熟男人对生活的思考和理解。他告诉闷着头准备一条道走到黑的孙红雷，你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分到城里中学做了老师，你是全村人的骄傲。现在，你父亲没了，你回来了，你看到了母亲在院子里冻着，你是一个男子汉，全村人都在看着你……

那一刻，孙红雷一下子明白了。父亲没了，他这个做儿子的，还只能伤心吗？他不能，他还有一个老母亲，他要先把老母亲带回家，他不能让雪地里悲痛欲绝的母亲再冻坏了。

再站到镜头前，孙红雷扮演的生子用他的臂膀揽起母亲，他丝毫不带哭腔地说，妈，天这么冷，咱回家去吧，说着话把母亲揽回了家。

这个表演和张艺谋达成了共识，只一条就通过了。

这件小事儿影响着孙红雷的表演生涯。孙红雷说，在这儿，我学会了一个观念，那就是，一切表演，都要在假定环境里，把表演做到绝对的真实。孙红雷说，是这个表演观念影响了他的表演，成就了他的今天。

摘自《齐鲁晚报》

理想主义的人是最美的

许 晴

不做宋庆龄的“特型演员”

演出《建国大业》之前，有不下三个剧本的“宋庆龄”来请我演，包括《大清风云》的导演陈家林，在我们拍戏的时候就说，“许晴你应该演宋庆龄”，还有《红磨坊》的导演，拍《水浒》的张绍林也这么说。他们都是老导演，都是60多岁，对宋庆龄有所了解。《建国大业》找我演宋庆龄，我并不惊讶，但是演出1945～1949年的宋庆龄，我有点扛不住，因为年龄相差有点远。

我收到邀请的时候，还在美国上学。他们说，那来试一下妆，好不好，你来感觉一下。化妆师王希钟老师也很优秀，他特别有意思，没有给我贴这个贴那个的，他说：“许晴，我认为不需要，你的气质和场足够了。”所以我在造型上就是把头发一梳，甚至连眉眼都没有特别刻意地去弄。因为他觉得已经有很多特型演员了，不希望我再去做宋庆龄的特型演员。

演宋庆龄需要沉静下来

演宋庆龄的时候整个人要沉下来静下来。

历史上，见过宋庆龄的人，都会说“她真的太美了”。她确实非常美，但她的美不是表面上常规所说的那种五官怎么美，而是她的气韵。她的这种气韵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造就的，而是从骨子里从小而来的。这关系到她整个的学识背景以及她整个家庭的成长环境。我在上海的时候，专门去拜访了她的故居。她的那间屋子，家具全部是纯白色的，欧式的，地上铺了厚厚的地毯。还有一间上了锁，我们想办法从门缝里看进去，发现那是间书房，四壁全都是书。

我这次演宋庆龄，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说别的演员都是在演那个时代，唯独许晴是进入了那个时代。领导说，你看她鼓掌都是这样子，手臂是斜着的。这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看了资料片，宋庆龄鼓掌就是这个样子。我确实做功课做得比较多，因为不能怠慢。我会特别注意这些细节，包括她的神韵。我觉得她最有灵魂的是她眼睛里的爱，而且是慈爱，我觉得这才是最吸引人的。她坐在那儿就那么静，但是心里的场却那么大，她也不用说话。

理想主义者是最美的

有一场戏，我拍摄的时候真的很感动，但是没有剪进去。那场戏就是宋庆龄和邓颖超一起谈论她们孩子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人都没有孩子，她们的孩子都在革命中流产了。那场戏我们拍了两夜，很动情，一直在哭。那场戏是特别女人、特别阴柔的，看上去好像和整个电影的氛围不是很搭调，但其实我觉得特别搭调。革命轰轰烈烈，死的是男人，受伤最深的是女人。革命的成功，后面有许多人在奉献。

邓颖超是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命令去请宋庆龄出山的。我觉得，当时宋庆龄的心境，是不再想登政治舞台。但她对新中国还是寄予期待的。我不认为她是心灰意冷，我认为她表面是退，心还是在那里的，她对时局是很清楚的。尽管有个代总统，但是蒋介石还是掌管一切的，她一直在关心着，我认为可能比她在位的时候还要更关心。

有一场戏，是解放军官兵进上海，为了不扰民，都睡在街上。宋庆龄出去看到了，那场戏我的表情是悲悯的。我觉得她心里有悲悯之心，就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她对共产党有了信心，又找回了和孙中山一起革命的心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后来才答应去北平。我一直认为宋庆龄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是活得最辛苦的，也是最美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名人趣事趣谈

李鸿章晚年易怒，动不动就扇别人耳光。但被他扇了耳光的人，或升迁，或赏赐，二三日内必得佳音。所以在他门下，寡有气节之士。

张宗昌性格豪放，挥金如土。他有一次坐黄包车，计价不过数角而已，他甩手就是一张10元钞票。车夫以为要找零，身上却无现钱，惶急不已。张看到车夫犹疑，却以为对方嫌少，冷笑道：“穷人心狠！”一探手又掏出8张10元钞票给他。车夫始知其意，喜出望外。不料张的跟班落在后面，竟向车夫索回那八张。张极为警觉，在前面大喝一声：“这是他的，你想干吗？”令他还给车夫。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二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其请安三次，清晨九时一次、下午三时一次、晚上九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听差、厨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时已下午三时，章犹自午睡不醒，听差必联袂入房，就枕畔低语：“大人醒来，打更时间到了！”按例章每日可享受两个大洋的菜肴，极尽丰盛，他便要求只做1块钱的，剩下的1块钱公然饱入私囊。但即便是这1个大洋的菜肴，光他一人享用也过于丰盛，他从来只吃摆在面前的两个菜，对摆在远处的则懒得举箸。久而久之，伺候他的听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处，而把鲜腴的菜肴放在远处，等他吃完后，听差们便自己享用。后来钱玄同晓得了，便和官方取得联系，将两个听差开革了。

张大千不懂洋文，却周游列国。他在国外经常迷路，于是托人用洋文写了一张帖子带在身上，文曰：“愚，张大千，中国画家也。现住某城某街某号。因不识洋文，以致迷途难返。尚盼过往仕女君子，援我一臂，送我回寓，不胜感纫。”他身着长袍，足蹬布履，长髯飘洒，仪表雄奇，故这一招在国外居然屡试不爽。然后来李宗仁初至美国，张大千以此法相授，李却始终不敢一试。

段祺瑞向日本大量借款，大总统冯国璋十分忧虑，问段如何偿还。段答道：“入不敷出，不举债怎么办？至于还债的问题，日本对我们如此，我们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起来，赖着不还便是！”

摘自《读者》